经济所、经济所人与中国经济学

高尚全 朱玲等

编者按:本文内容是根据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等8位专家学者在经济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2019年5月17日第三单元圆桌论坛“经济所、经济所人与中国经济学”上的发言编辑整理而成。本场圆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玲研究员主持。

朱玲: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玲,由我主持这一单元的圆桌论坛。首先有请高尚全先生,他以前是体改委的副主任,后来曾担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高尚全:首先,祝贺经济研究所90华诞!90年来,经济研究所为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过紧日子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过紧日子的长期性、重要性,必须充分认识。不要以为今天经济下行了,就过紧日子,明年上行了就不过了。不行的!要有一个长期性。要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都要考虑到过紧日子,而且是长期过紧日子。第二,政府是过紧日子的主体。现在大家都在号召过紧日子,主体是政府。第三,要鼓励老百姓高高兴兴地扩大消费。因为这样才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第四,要增强纳税人意识。因为过去大家这个意识比较薄弱,现在要有纳税人的意识,财政支出要受到纳税人的监督。第五,企业过苦日子。特别是任正非、曹德旺等企业家都提出这样的号召,我非常赞成,为什么?任正非的危机意识非常强,他写了一本书《下一个倒下来的会不会是华为》。有忧患意识的人是不会倒下来的。第六,关键是政府要带好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牵涉到改革。过去一些干部出了贪污腐化等问题,问题出在公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约束、没有限制。所以,改革的方向要限制公权,这是一个趋势。

公权力怎么限制?我觉得习近平同志讲的三条非常好:(1)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过去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以至于出现了好多问题,一定要把它关进笼子里。(2)公权来自何方?来自老百姓,是人民授予的。所以,掌握公权力的人一定要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3)使用公权力要有一个法定程序,应该经过人大的决定。

楼继伟:略。

朱玲:下一位是洪银兴先生。他是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我要强调的是,他的研究方向是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的理论和政策。

洪银兴:首先祝贺经济所成立90周年!我现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它的理论指导力,但是它的基础还是对现实的解释。为什么?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弊端或者不足是,它的研究对象太窄,而且只是在经济本质上面、生产关系的本质上面研究,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拓展其研究对象,要由过去单纯研究生产关系拓展到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而且不仅仅是研究面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深入。深入研究不是指深层次地再进一步到本质上,应该要深入到现实层面。经济学的研究如果说只是在本质的、非常深入的层面,很难解释现实。经济学的研究要面向现实、研究现实问题,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问题导向,讲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科学。

第一,经济制度的研究。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往往纠缠于公有制、私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要素分配等一些问题上。哪个比重大、哪个比重小,这个问题,40 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定论。不需要再走回头路,不需要再颠覆性地深入,所以这种纠缠性的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不要在象牙塔里争论,要回到现实。比如,研究所有制,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产权关系。这个产权已经不仅仅是过去讲的所有权,它涉及各种要素的所有权,涉及三权分置、产权结构、产权流转等。如果政治经济学对所有制的研究往现实中间转,谁能说它没有用?谁能说它对现实没有指导?

第二,经济运行的研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完全可以以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起点来研究,如何让市场更好地、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就像现在,市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市场不完善。经济学的研究能不能往这方面更关注一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点在哪里?尤其是对公共经济的研究,宏观经济稳定的研究,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特别关注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供给侧改革最终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有人说全要素生产率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不能用。那么,供给侧改革最终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能再纠缠于这是西方讲的,中国就不能讲。确确实实要研究怎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宏观经济研究既讲定向调控,又讲区间调控,还涉及金融稳定。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样一种研究就是面向现实,回到现实上来了,不是纠缠在市场决定资源分配上面。如果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三,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问题过去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概念,不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领域。现在看来,发展生产力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现在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实际上给政治经济学研究开拓了非常大的空间。如何按照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研究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尤其是创新的问题,创新驱动成为第一动力,这个问题交给谁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应该来研究。我今天看到高培勇副院长等主编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理论大纲》,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对中国的长期发展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深入,但是不是深入到象牙塔里面去,而是要深入到现实中去,必须要有问题导向,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指导国家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科学理论。

朱玲:谢谢洪先生!看来改革开放还要继续,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也要继续开放。1978 年的时候,实事求是、思想解放,那个时代大家创新的劲头就来了,现在还得继续。下一位有请黄群慧先生,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国有企业改革、工业发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等。

黄群慧:刚才各位前辈对经济所、经济所人表达祝福。我代表晚辈对经济所、经济所人表达一些祝福。

首先,我代表工业经济研究所对经济所 90 华诞表示衷心的祝贺!工经所和社科院一系列经济片的研究所都是从经济所划分出来的,至少工经所是 41 年前以经济所的工业组为班底,从经济所划分出来的。说工业经济研究所有经济所的基因,可能比较准确。

既然经济片各所都是从经济所分出来的,都有基因,工经所有什么特殊的地方?2018 年工经所 40 周年所庆的时候,高培勇副院长强调过一点,工经所和经济所是最有渊源的或者是最亲的。亲在哪里?工经所诞生之日起一直和经济所同一地点办公,直到现在还是。两所在月坛北小街 2 号有至少 38 年共同的美好记忆,到目前又在国谊宾馆商务楼一同办公了两年。作为一个和经济所距离最近的研究所,最亲的所,我代表工业经济研究所向经济所 90 华诞表达发自内心的祝福,祝经济所发展得更好!

另外,我个人也是晚辈。能够选择走经济研究的道路,确实非常感恩经济所人。我 20 多岁的时候,硕士毕业,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老师。当时所有经济学人有一个“中国梦”——在《经济研究》

发表文章。当时我这个普通的青年学者就斗胆给《经济研究》投了一篇稿子,而且很快被刊登了。当时我很振奋,实现了我学术的“中国梦”,确实加深了我一直做学术研究的决心,选择经济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决心。所以,我现在做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研究》这本杂志的引领,也得益于经济所人的指导。这里要感恩经济所人。

因为圆桌论坛有三个关键词:经济所、经济所人、中国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对中国经济学而言,当今正面临一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正是理论创新和思想创新最好的新时代。所以,推进经济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是中国经济学者非常光荣的时代使命。

如果具体分析这个新时代,从中国的情景来分析,至少有四个情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这个情景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快速推进到了工业化后期。2010 年之后就到了工业化后期,这也恰恰是蔡昉副院长提到的 2010 年之后人口红利消失的阶段。这个阶段,所有的经济学主题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包括创新作为一个主要的驱动力。

从制度情景来看,中国已经通过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在还正在逐渐完善,也有一些瓶颈,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从技术情景大变革的时代来看,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现在叫新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会带来经济学的方法变革,包括很多经济学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一些命题、一些理论都可能需要重新论证。

从国际情景来看,中国现在已经融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都面临着深度调整,包括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会是中国经济学要解决的新的问题。

面对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巨大的情景变化,中国经济学应通过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来寻求突破和发展。要想实现发展,要坚持四个方面的原则:第一,指导思想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第二,在研究问题上,要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和解决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相结合。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要坚持自主创新的思维和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过于注重科学的方法,而忽视了创新的观点、创新的思想。第四,在学科建设上,要坚持经济理论的创新和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的结合。

我围绕论坛三个关键词谈了以上内容。如果概括一下,这三个关键词就是,祝福经济所 90 年华诞,感恩经济所人,迎接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朱玲:谢谢黄群慧先生!下一位是盖保德先生。盖保德先生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他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办事处代理主任和副主任,以及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处的官员。

盖保德:首先感谢社科院经济所的邀请。当我在教经贸课程的时候,我对中国很感兴趣。中国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广义次优理论。该理论是利普西(R. G. Lipsey)和兰卡斯特(K. Lancaster)两个人提出的,1956 年发表于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它对更好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至关重要。简单来讲,广义次优理论说的是完美市场情况不存在,政策的制定者不可能使用完美的市场理论去制定政策。完美市场理论会有很多模型和预设,政策的逻辑是基于这种简化的假设。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广义次优理论告诉大家,在真实的世界中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得知经济体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不仅如此,如果经济学中简化的预设不成立的话,这种有关市场的理论及政策甚至会有害,可能会影响到国家运行。世界上也涉及国家政治的情况,有些国家的政治势力会用市场的政策来支持其政见,这些政治势力可能根据这些市场政策说,只要给市场更多的权威,国家就会变得更好。这实际上能给政府带来一些好处,而这就是政府已经享受了的经济上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去维持这个现状。但是次优理论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市场的政策可能并不会带来好处,反而会有害。因为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次优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非常谨慎使用市场理论。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次优经济体。中国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反对非常激进的市场政策

和理论。中国仍然需要谨慎运用市场理论。虽然这样,中国的发展现在却非常成功,而很多其他欠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实现中国这样的成功。中国成功背后的秘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标准的市场政策。市场并没有扮演主导角色,次优的政策实际上要求政府去主导,要求政府干预、政府调控、政府补贴,以及政府限制。这些次优政策可以使市场力量形成更好的合力。次优的制度实际上对健康的市场力量发展很有必要。而中国的发展政策也给了学者一些想法,让大家了解到次优的经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其中有一些例子是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其他一些是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第一,投资率,达到 30%~45%,这实际上对快速增长、减贫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有统一的投资管理机构。次优经济体需要长期和短期的规划,中国有国家发改委去做这件事情。第三,对公共产品投资的重视。市场实际上是不会去支持满足对公共服务和投资方面的需求,而很多人都会反对在这方面进行赤字预算,而中国使用了比较好的机制去提供这方面的供给。第四,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有国开行,而次优经济体是非常需要这样的开发银行,而且运行良好。第五,非独立的中央银行。所谓的非独立,实际上有可能是有一些独立性的,但是它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一个国家的银行业。而央行也必须支持对公共投资的高额利率。第六,国内金融逐步放开。如果是非常快速放开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些很严重的经济不稳定情况。第七,进行补贴去避免长期的瓶颈问题。市场力量对未来的准备总是不够充足,很多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这些瓶颈就会造成短缺和通胀,进而又会造成增长放缓和减贫放缓。对这方面进行补贴,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就非常必要,而且有好处。

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第一,中国在贸易方面对新兴企业有一些保护,这实际上能促成一个真正公平的竞争市场。第二,对外界的热钱进行比较紧的管控。次优经济体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稳定性,避免汇率剧烈波动。如果管理不好,有可能会造成所谓的“荷兰病”。政策应该去控制货币的升值。第三,积累一些外汇储备。积累外汇储备对次优经济体非常有益。不应该为了满足公共预算就向国外借钱。这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次优经济体忽略了这个政策要素,所以就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第四,技术的获取应该和 FDI 结合。次优经济体需要快速赶上发达经济体,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理解为什么次优理论对发展中经济体如此重要。为帮助学生理解,我经常会使用中国经验去给学生举例。但是我还得说,次优理论实际上对更多的发达经济体也是适用的。美国实际上也是一个次优经济体,它也需要次优的经济体制、政策。

朱玲:谢谢盖保德先生!他讲得非常有理论性,又贴近现实。他现在还在乔治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讲授一门中国经济研究生课程。接下来是陈思宽女士,她是中华经济研究院(中国台湾)的院长和教授,她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陈思宽: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也借这个机会祝福经济研究所 90 周年生日快乐。

我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经济动能转换新思维”,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台湾地区“地方创生”政策的经验。

目前台湾地区面临三个最重要的分配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均,也就是城乡发展差异日渐明显。一类城市的人口是增长的,其他规模城市人口一直在流失当中,这是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第二个面临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是贫富不均逐渐扩大。如果把群体按收入高低分成十组的话,最低组收入跟最高组的收入差距随着时间一直在扩大。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青年人口贫困比例比总体平均贫困比例要高。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高龄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台湾地区在 2018 年迈向高龄社会,也就是说 65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14%,推算 2026 年台湾地区就会迈向超高龄社会,也就是 65 岁以上的人口会超过 20%,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在这种状况下,台湾地区就借鉴日本的“地方创生”政策的发展经验。因为,日本跟台湾地区同样面临高龄化、劳动力流失的问题。日本为了实现国土人口平衡和维持经济的活力,率先推出了“地方创生”政策,所以台湾地区目前借鉴日本的创生政策,希望能够抑制人口减少、促进人口年轻化,提高生产力,并且与大自

然共生,保障地方的生活,同时活用地方资源,抑制人口持续外流。

“地方创生”政策根据地方的特色发展地方的产业,希望通过人口回流、青年返乡解决人口的区域和城乡变化。所谓“创”就是创意、创新和创业,“生”就是指地方的生活和生产。其目的是有效盘点地、人和产品,最后能够达到“地方创生”的目标和愿景。

第一,优先选择偏向一些地区实行“创生”政策。第一个是制定政策辅导青年返乡创业,发展产业的六级化,完善地方基本生活的机能;第二是要强化城镇中介服务的功能,能够连接都市和农、山、渔村;第三是协助当地的就业和创业,进行专业人才开发,强化教育、医疗照护等公共服务。这样的政策,第一,结合了投资科技和基础建设,鼓励企业能够投资故乡,通过赋税的优惠和法规的调整等因素,协助地方产业兴起,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也是目前世界都在重视的。第二,结合科技导入协助创生事业。把科技化、智能化导入地方,从生产、制造、销售一直到品牌的建立和运营管理等不同方面,去达到“创生”的目的。第三,健全基础环境结构。

项目在金门和屏东做试点,都很成功。虽然两岸发展条件不同,台湾地区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比如,合理分配资源,对接城镇化发展;强化社区功能,满足居民需求;利用地方文化特点来发展地方特色经济。

朱玲:听到陈思宽女士的发言,大家可以意识到海峡两岸有共同的问题,甚至有相似的政策。接下来是黄佩华女士。她是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公共事务。此前,她做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高级职员,也在牛津大学和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

黄佩华:很感谢社科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家”。1982 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做长期调研,接待单位就是经济所。经济所给我分配了两位导师,就是吴敬琏和陈吉元两位研究员。那个时候,我也认识了赵人伟、张卓元等老前辈。所以,很高兴能有机会回来看到一些老朋友们。

高培勇副院长是研究财税问题的,我们也是认识多年。我今天就谈一谈财政问题。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一直研究中国财政问题。一方面,从那时开始,中国的财政状况变化非常大,公共财政收入从 1990 年到现在增长了好几十倍,从不到 1 亿元到现在已经是 30 多万亿元。用美元来计算,跟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来比较,也可以看到变化的情况。在 2000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综合财政收入)占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是 14%,到 2011 年,中国的预算已经稍微超过美国联邦政府,现在还在逐年上升,已经超过美国 10%多一点。可见,中国的综合财政已经超过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规模。当然,这个比较也不是很准确。

另一方面,支出结构改变也非常大。从 21 世纪开始,预算支出大幅度往民生支出转移。为解决“三农”问题,政府从农村公共服务开始出台了许多新的项目。比如,免费农村义务教育是 2005 年开始的,受益人数当时是 1.5 亿,现在这个数目下降了一点,但是还是很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是 2005 年出台的,受益人数超过 8 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保)2007 年的受益人数是 5000 多万;还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等。

财政预算支出构成逐步向民生支出转变,是世界的趋势。一般来说,OECD 国家、发达国家,其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二是用于民生的(养老、医疗、教育、社会救济等等)。中国以后也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变化。人口老龄化,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使教育投资和卫生投资是逐年增加的。

中国有五级政府,这样的支出转移和结构转移对政府间财政关系带来巨大的影响。我刚才讲的那些民生项目差不多全都是底层政府(县区级政府)执行的。推出大的项目,会加重地方政府的支出。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县级(包括区级)政府的支出占全国预算内支出的份额,从 26%增加到 46%,这是非常庞大的。但财政支出往底层政府大规模地、短期地转移,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地方政府是怎么样支付的?地方政府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财政分配制度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没有太大的改变。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大家已经讲了二十多年,这个问题其实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基层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而转移支付是从中央级转到省级,省级转到市级,市级再转到县级。在过去十年,中国建立福利型社会给财政架构、行政架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

长和经济变化需要政府间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

最后,在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对话里,好像有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没有人提到。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有多大?其他国家促进经济增长,大部分留给市场,但是在中国,政府非常关注增长。每一个地方政府都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展望未来,要不要考虑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要维持下去吗?中国的事权应该交给每一级政府来做吗,还是应该上升到中央级或者省级?要不要每一级政府都来做这个?这些问题都需要解答。

朱玲:谢谢黄佩华女士!她提出了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另外,她也提到了现在民生改善需要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她的数据支持了高尚全先生的说法,就是钱都在哪儿,主要在中央一级政府。我们要过紧日子,就要让中央政府过紧日子。最后一位发言的是赵学军先生。他是高尚全先生的博士生,现在是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拥有 20 多年的金融投资、资本市场运作和公司管理经验。

赵学军:首先祝贺经济所 90 华诞。今天我也特别荣幸来参加这个圆桌论坛,更加荣幸的是能够跟我的博士生导师高尚全主任在同一个论坛。我已经在金融行业工作二十多年了,我想从金融投资的角度说一说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从事金融投资高度依赖理论。无论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还是市场有效理论,以及在一个金融市场投资当中用什么样的方法最正确和最有效,所有这些都是理论问题。比如,金融理论最根本的假设是市场有效假设。今天被动投资 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在西方主导性发展就是这个理论的胜利。嘉实基金博士后流动站有位博士后的工作论文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 β 值只有 5%,也就是它的斜率只有 5%,α 值只有 5%,而在美国,β 值是 8%,α 值在 0%~2%之间。这意味着中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通过这样一个研究和理论框架,可以看到,在中国市场进行投资,什么样的方法最有效。不是西方那种被动投资的方法,也不是看技术图形或者用量化投资的方法。在中国市场,最有效的方法是基本面投资。

在实践当中,由于假设过于理想化,理论和实践还有很大的差距。业界常常讲长期均衡和过度理想化的模型,当用真金白银投资的时候不能等那么长时间,也不能那么理想化。如果仅仅用理论的方式去做,就会有很大的损失。

西方金融理论全部建立在有效市场的假设上。有效市场假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配置当中的有效前沿。美国股票市场的有效前沿也就是市值做权重的指数,主动投资很难战胜有效前沿,在西方是对的,但是在中国就不对了。因为,中国市场的行为和方式是非有效的。也就是说,国内市场的信息传播是逐层的,而不是同时的,不是同一质量的。在中国做风险管理也好,做组合管理也好,基本上所用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假设上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是不够的,所以,要重新构造中国的有效前沿。只有重新定义有效前沿,才能把理论和实践投资更好结合在一起。

朱玲:谢谢赵先生!感谢八位发言人从自己最擅长的角度给我们带来了知识和信息,也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编辑整理:何 伟)

(校对:杨新铭)